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战前的槟城华团研究——以槟城嘉应会馆 会议记录为依据（1921年-1937年）

A Study of Penang Chinese Association Before Second World War based
on Meeting Minutes of Penang Kar Yin Association (1921-1937)

余汶慧

YEE WEN HUI

16ALB0429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0.**

战前的槟城华团研究——以槟城嘉应会馆会议记录为依据（1921年-1937年）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余汶慧 YEE WEN HUI

学号：16ALB04291

日期：24/4/2020

论文题目：战前的槟城华团研究——以槟城嘉应会馆会议记录为依据（1921年-1937年）

学生姓名：余汶慧

指导老师：杜忠全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论文是以槟城嘉应会馆为研究对象，将会馆的会议记录作为主要的历史文献，研究年份是介于1921年至1937年。此研究内容将从这段时期开始切入该会馆的历史发展。

作为最早成立的地缘性会馆之一，槟城嘉应会馆拥有超过两百年的历史。该会馆由客家嘉应五属华侨所创办，并努力维持活动至今。故此会馆的史物与文献资料拥有相对的研究价值。透过二战以前的会议记录，可以窥探早期槟城华侨的思想意识，并可以了解会馆早期与外界的关系以及当时的内部运作概况。虽然会议记录的内容并非完无缺漏，但作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其历史真实性是不容忽略。

整体章节安排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探讨，即会馆的结构与制度沿革、会馆内部的活动与运作情形、以及分析会馆与各界的互动。研究视角为由会馆内部的活动引申至会馆的外部的活动。本论文先把会馆制度的改革变动整理出来，再探讨会馆本身的内部活动以及其经济状态，最后着重于会馆与外界的联系作出论述。如此的设定是为了以这样的形式完善呈现会议记录的内容。

透过整理会议记录内容，能更深入了解马来亚华侨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里，他们对祖国、侨胞社区的回馈，也可以探究华侨对故乡、同乡的互助精神与支持。除了叙述华侨在组织同乡社团的过程，记载会馆的与外界的书信来往，亦是从会议记录这层面分析槟城华侨社团的经营概况。

【关键词】 战前、华侨、槟城嘉应会馆、会议记录

致谢

这份论文研究能够顺利完成，本人在此向所有帮助与指导我的长辈与家人朋友谨致万分谢意。

首先要感谢论文导师——杜忠全老师对我的指导。他帮忙解答我面对的难题，提供不少建议，也拿了他曾研究的相关课题供我参考。刚好这期间遇上里行动管制令，虽然无法与导师会面讨论论文进展，但是我在线上依然可以向他联系咨询，老师也愿意在通过社交媒体批改我的论文内容。此外，我还要感谢陈爱梅老师提供我这个机会去研究檳城嘉应会馆的会议记录。因为在她的提议与鼓励下，我选择以会馆会议记录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也才有这项课题的研究成果。我虽然不是她的直属论文导生，但是老师愿意与我讨论论文内容的安排，并且牺牲周末时间在今年一月三日那次陪我去会馆做田野调查。她更是引荐了会馆的前会长拿督斯里李尧庆给我作为采访对象，让我能采集足够的史料与资讯完成研究工作。承蒙两位老师的指引，让我在学习历史研究这方面上获益良多。

除了两位老师指点，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也感恩有获得贵人相助，即前文提及的拿督斯里李尧庆。身为檳城嘉应会馆兼马来西亚嘉应属会联合会（简称嘉联会）的前任会长，他不仅愿意与我见面接受采访，对我的研究课题亦是深感兴趣。他曾经与我数次讨论论文内容，同时也把他收藏的《檳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借给我作为论文的参考史料。他的热心协助，给予我完成这份研究论文很大的支

持。其次我也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完善了口述资料来源。感谢宋彦鹏愿意透过社交媒体和我进行线上访谈，解答我对战前会馆研究的疑惑。也感谢槟城嘉应会馆的理事陈芙蓉女士愿意在我进行实地考察时候从旁协助，也配合接受访问，透露一些会馆的近况。感谢这些长辈的热心相助，为我采集资料过程提供便利。

最后，谢谢我的家人与朋友们的精神支持，他们的鼓励陪伴我熬过撰写论文的日夜。对于所有人对本论文的一切支援，我衷心地表达感谢。

目录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6
第四节 论文架构	8
第二章 会馆组织的制度沿革	10
第三章 会馆的运作概况	
第一节 阅报所与夜校计划	15
第二节 会所的重建计划	17
第三节 会馆财务状况	20
第四章 会馆与外界的互动与联系	
第一节 与华人社会的互动	24
(一) 对祖籍国的关注与回馈	24
(二) 与本地华侨社团的联系	30
第二节 与英殖民政府的互动	33
第五章 结语	36
引用资料	38
附录	4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槟榔屿最早出现的地缘性会馆组织是檳城嘉应会馆。其成立的年份可以从史料和地契的记录追溯至 1801 年，为马来西亚历史最古老的乡会之一。会史里便说明会馆“成立于公元一八零一年，清嘉庆六年辛酉，距莱特占领檳城（1786 年）后十五年。”¹ 至今已成立超过两百年，可谓历史悠久。

自英国占领槟榔屿以来，关于马来亚华侨的历史有如此说法：客人开埠，广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² 客家人极可能是最早移民来到马来亚的华侨群体，也因此组织了属于同乡侨胞的社团，即嘉应会馆。身为一个在英殖民时期就存在的会馆，值得探讨的是这华团在二战以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从会议记录中关注内部会务的运作，从中了解会馆和各界人士和团体的关系以及互动。本论文将会针对檳城嘉应会馆如何回应祖籍国的事件，进而列出会馆对祖国的回馈贡献。

檳城嘉应会馆于 1921 年开会议决废除原有的炉主制度，也在同年修改并设立了新的章程，可谓会馆的重大改革之一。因此本论文会梳理会馆在制度上的改革后，如何以新的“董事制”来运作组织活动。透过研究会议记录，无论

¹ 檳城嘉应会馆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檳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檳城：檳城嘉应会馆，1987），页 13.

² 今崛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檳城：檳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页 83.

是组织内部的活动抑或是对外务的行动和表态，都是可以去探究这槟城嘉应会馆在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下的运行状况。

本人在机缘巧合下从陈爱梅老师那里获得会馆 1921 年至 1937 年的会议记录，实属难能可贵。由于槟城嘉应会馆面对日本军侵袭时候会所遭到破坏摧毁，许多文件资料已经遗失，所以幸存的部分史料文物将会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来源。槟城嘉应会馆的这份会议记录算是马来西亚二战以前少数有保存下的文物，据宋彦鹏的论述，他曾研究的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记录是目前唯一有系统性保留下来的战前记录。其会馆的会议记录从 1930 年代至 1971 年（除了日据时期停顿之外）保留得十分完整，只是 1971 年后的记录没再公开了。³ 而槟城嘉应会馆因二战影响，自 1938 年至 1944 年的会议记录都失存了，可见二战前的文物是为难能可贵。

既然有幸翻阅到这份二战前的会议记录，自然是要好好整理这份珍贵的一手资料并解剖内容。正是如此我便有这个责任需要将这份会议记录汇整并记录成电子文字方便保留，也许这也是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所在。因此本人的研究全文内容会是专门处理《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这份史料来撰写此论文。作为第一手资料，会议记录可以呈现当时会馆所进行的活动、讨论的议题与面对的困境等重要事件，也有清楚的记载年份日期。通过分析这些会议记录，可以看见槟城嘉应会馆与各界的互动，梳理出会馆内部的在那个时代的具体概况。而在处理会议记录内容时，从理事们开会讨论的回应和提议可以分析当时的华侨社会情况以及处理事务的心态。

³ 宋彦鹏，〈战前会馆的会议记录〉，采访于 2020 年 2 月 5 日。

笔者本身是客家嘉应人，但可能是家里亲戚长辈一直以来对籍贯的重要性没有太多认知，以致我们晚辈如我本身也是到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籍贯是客家嘉应。随后在大学的一门课马来西亚华人概论里，陈爱梅老师的授课启发了我对自己的籍贯、家族史等自身身份历史的关注，也因此选择华人地方历史研究为本人书写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而在有机会接触到槟城嘉应会馆的历史资料后，身为一个客家嘉应人我便有意去发掘并追溯自身籍贯的历史和文化，也算是以己绵力为同乡会馆做史料保存。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综述

本人在完成这份毕业论文的时候参考了萧新煌主编的《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里头收录了利亮时撰写有关檳城嘉应会馆发展概述的一篇论文〈锡、矿家与会馆：以雪兰莪嘉应会馆和檳城嘉应会馆为例〉。从他的田野调查研究中我获取了檳城嘉应会馆的地契资讯，也查看有关会馆二战以前的概况。这篇论文对比了这两地嘉应会馆的组织发展与活动，在檳城嘉应会馆的篇章里他大体上有整理了 1921 年到 1986 年的会馆会议记录，主要是陈述该会馆的发展历程印证他论文的观点。利亮时的这份研究也撰写了两地会馆的财力资源和二战以后两社团对华人社会的回馈，这点也是我学习其梳理史料的方式。

杜忠全曾写有关檳城嘉应会馆的研究论文〈从祭神到俱乐：檳城嘉应会馆立社功能之恒与变〉，论述了会馆在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社会功能与其转变。他的研究谈及檳城嘉应会馆的炉主制度的改革与功能变化，也分别讨论嘉应会馆的附属组织嘉德社和嘉宾俱乐部在时代的变动中衍生而出的辅助功能。按照该文的观点，檳城嘉应会馆的活动主轴在于祭祀，其创始与长期延续功能一直在这方面不曾改变。⁴ 我会从此篇章借鉴一些有关檳城嘉应会馆炉主制度的概述，读取这制度改革以前的运作模式和演变缘由。这份研究的时间轴跨越了檳

⁴ 杜仲全，〈从祭神到俱乐：檳城嘉应会馆立社功能之恒与变〉，《客家文化、认同与信仰：东南亚与台港澳》，（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社，2015），页 57。

城嘉应会馆成立以来 200 多年，从整体观察会馆的历史演变，同利亮时的研究是十分宏观的研究视角。

从石沧金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一书，他列分出华人组织的特点，并分析了早期华人方言组织的结果形成，提供我清楚的概念去观察檳城嘉应会馆当时的组织制度。在理解那个时代的华团历史实况后，方能去分析会馆组织在会议里的表态和付出的行动。而透过宋彦鹏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我参考他考察社团的研究架构，借鉴他关于雪兰莪福建会馆关注中国事务的论文协助我写出我的研究架构。

在处理这项研究课题上，我目前没有找到有关檳城嘉应会馆在二战以前和外界的互动的研究，鉴于会馆内部运作方面的问题是还未有太多发现。因此本论文会察看会馆在当时的开会状况，从中具体分析檳城嘉应会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以前这段期间与各界的交流与联系。虽然关于檳城嘉应会馆的研究是不少，但我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的视角在于本论文会更多会是针对会馆和外界的互动，以 1921 年至 1937 年的时间段为研究范围。

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通过一手史物资料的研究与探索完成写作。我的史料是以檳城嘉应会馆从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廿七日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为依据，透过整理该会馆的会议记录，探讨会馆在二战以前的内部运行以及与外界的交流联系。

（一）文献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主要文献是《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我将从会议记录里梳理并统计所需的数据资料，并在1921年至1937年间，针对这段时间划出中国与马来亚所发生的大事件，分析檳城嘉应会馆的理事如何作出回应。通过会议记录我也会记录那段时期的历年董事部理事人员，同时把会馆修改后新的章程制度在论文里列出。与此同时，在文献方面我也会引用一些重要的会馆组织的纪念特刊为辅助史料，其中包括《檳城客家两百年：檳榔屿客属公会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檳城嘉应会馆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以此巩固论述观点。

另外，我为了把握檳城当时社会背景，查阅一些马来亚华侨历史的书籍。其中就包括颜清煌《新马华人社会史》和巴素《马来亚华侨史》等书帮助我对于华人移民史研究以及华人史研究的基础理论有深入了解，并探讨会馆与当时华人社会的关系。我也另外参阅颜清煌的《海外华人史研究》里的专章，辅助我论述南洋华侨对中国战事的反响心态。

（二）实地考察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槟城嘉应会馆，本人于2020年1月3日和3月7日亲自上门去参观会所。会馆里依然存有战前主干理事的画像、印有光绪年间的神龛香炉等古物，均被一一拍照保留。本人也发现会馆重建落成纪念铜牌，铜牌上印刻的文字记载用作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来源。

走访期间更是有幸能够与槟城嘉应会馆兼马来西亚嘉应属会联合会（简称嘉联会）的前任会长拿督斯里李尧庆博士以及现任会馆总务（2018/2019年度）陈宽蓉女士进行访谈，从中能得知关于会馆的运作现况。

（三）研究难题

我目前所拥有的历史文献仅有这本记载着从中华民国十年（1921年）八月廿七日的会议记录一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其中这十八年间的记录是有残缺的页数，可谓不是十分完整的史料。槟榔屿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候遭到日本军攻陷，槟城嘉应会馆即没有幸免，会馆里历年所存有的旧簿、议案等一切重要文件多数被销毁，只有一小部分因私人保留才能依然存留至今。一些史料记载无从查询，本人仅从一本会议记录为唯一史料获取资料，研究内容范围也因此难免会有些狭小。由于这些会馆会议记录都是以手写抄录，我在阅读会议记录的时候会因为字迹潦乱抑或不清楚而无法一时间了解其内容，也有因为方言口语因素和错别字出现影响对内容的判断。因此在整理会议记录的时候耗费了不少时间在解读里头的字迹。

第四节、论文架构

本文的研究视角会是从内到外的形式去书写槟城嘉应会馆的功能与活动的发展历程，并以会议记录研究为主要范围。在章节分层的部分会设定为由会馆内部的运作作铺叙，才探讨会馆的外部的活动，这样一来便呈现由内到外的方向。本论文先把会馆制度的改革变动整理出来，再去看会馆本身的内部活动，最后着重于会馆与外界的联系作出研究。透过如此由内至外的扩大视角，能够顺着文章的流动去综观会馆在 1921 年至 1937 年这段时期所经历的事件和其社会功能的呈现。

首先，我将会在第二章节讲述会馆组织的制度沿革，主要讨论会馆章程的变动，列出当时的理事如何实行新的选举制度。我将整理出组织修改的章程内容，谈及这一年会馆里最标志性的改革：废除炉主制度，改设董事部。由此也一并探讨那时代会馆组织的构造以及发展过程。

在第三章节里我主要是从 1921 年至 1937 年内的会议记录，梳理会馆在这期间所进行的重要事件，借此观察会馆当时的运作情况。在分析开会内容时，我留意到会馆的财务状况是频密出现于会议里讨论，因此我支出一个小节对会馆的经济能力做出阐述。

接着，本文在第四章节将探讨会馆本身在当时与各界的互动与关系。这里的各界会重点划分为与华人社会的互动以及与英殖民政府的互动。在与华人社会互动的小节里，我将集中于讨论槟城嘉应会馆对祖籍国的回馈与支持。基于中国在那段时期发生不少战争和天灾事故，会馆对此是有积极赈灾筹款的表

现。这里也会把会馆和本地的华侨社团之间的联系作出论述，关注他们对于会馆外务的参与程度。这一章节也少不了会馆与英殖民政府的官方互动，而这里的政府代表华民护卫司署，曾出现几次在会议记录里，大部分内容都是开会讨论如何回复他们官方的信函。

回顾相关的研究文献，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檳城嘉应会馆的会用比较广阔的视角叙述会馆的历史脉络，故此本人想采用由内至外的研究视角去探讨会馆的经营和社会功能。先论及内部活动再处理外务互动，希望能够以这样的内容安排方式去完善呈现会议记录的内容。

第二章 会馆组织的制度沿革

檳城嘉应会馆最初成立的时候，同时并用几个名称：“嘉应馆”、“仁和公司”。该会馆于1923年6月11日向当地高级法庭申请，把“嘉应州公司”、“嘉应会馆”、“嘉应馆”、“客公司”、“仁和公司”等五种注册名称下的产业交给八位信理员管理，并且获得批准。⁵“嘉应会馆”这个名称是在1925年确立下来。会馆原本向英殖民政府注册的名称是“嘉应馆”，当时会馆的理事们想改作“嘉应五属会馆”，但他们的申请不被华民局接受，认为如此更改“有背原日注册”。⁶最后该会馆请一名会董汤日垣先生与华民局内部的职员调解后，在原名加一“会”字变成“嘉应会馆”，这称呼便沿用至今。因此本文内容将一律使用“嘉应会馆”的称呼。

1921年是嘉应会馆的里程碑，该会馆的组织章程在这一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从组织的领导层更迭制度，一直到新章程的订立，都可以从会馆的会议记录里找到相关纪录。新增订的会馆章程是在1922年6月17日的大众会议下通过成立，当时拟定的新章程一共58条条规，都详细地记录在会议记录簿里。（章程条规可参见附录一）

从会馆定制下来的章程里，可以留意到组织管理走向现代化的转变。从炉主制到董事制，在会馆理事的选任方式有所革新。新章程里的第十四项条规指

⁵ 檳城嘉应会馆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檳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页15.

⁶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5年

出，会馆的理事将会以选举的方法来任免，只有书记是授权于总理另外委任。⁷ 该章程里也有阐述会馆的选举程序应该如何进行。通常会馆的职员选举将会是以提名候选人的方式来进行。“选举职员用不记名投票法，以票数最多者当选……如有票数相同者由主席指认或加票表决之。”⁸

在此新的制度下，檳城嘉应会馆的管理层结构设置了总理一人、经理财政各一人、稽查一人、会董十六人及书记一人。在此新制度下，各理事的权责也一一列明于章程，以便各司其职。

总理职任为整顿本馆会务、监理本馆财产以及会议时取决各事项，并指挥各职员办事之进行皆其权责。经理有劝住总理、督率会董办理各事之权责。……会董有参与本馆会务助理、本馆财产、及力任议决各事进行之权责。⁹

从这安排可以得知，经理的职位如同副总理，在职能上有协助总理办事之责；新增设的会董理事们需要负责帮忙议事。章程里也说明所有职员都有责任去调解同乡侨胞所面对的争执投诉，并有权去开会商讨方案解决。这些章程的条规在会馆组织的管理结构上作出明确的分工，每个执委也可清楚知道自己的权限和责任。

当时，会馆也增定了几条规则来定下组织的选举制度，如一人不能兼任两職、所有职位任期以一年為限。对领导人或掌权人的权利实施制度性的限制，是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和专权现象的产生。¹⁰ 新条规里列明凡是檳城嘉应会

⁷ 〈新增定嘉应会馆章程〉，《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2.

⁸ 同上。

⁹ 同上。

¹⁰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页 140

馆的会员都有投票权及有被提名成候选人的权利和机会，反映了会馆在革新制度的同时也有民主化的倾向。

有学者指出 1890 年后的英殖民政府对华人社团相应的法律管理，推动了华人社团的发展，促进了社团机构组织的健全。¹¹ 虽然暂时无法考证会馆的改革制度是否受英殖民政府的影响，但按照会馆史料记载，“本会馆一向沿用炉主制度，每年轮流管理，嗣以岁久年深，流弊日升，属侨啧有烦言。”¹² 这可理解为会馆在当时可能面对管理制度上的问题，炉主制的领导管理出现缺陷，因此召开大众会议以商讨整顿办法，进而作出把炉主制度废除的议决。梁继琼撰写的〈槟榔屿嘉应会馆之沿革历略〉提到“一九二一年辛酉……一致议决废除炉主制，改设董事部，订立新章程”¹³ 根据这陈述而参阅该年份的会议记录，可以推测是 1921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大众会议，当时开会的原因是为解决会馆的财政事务。炉主制度引发了财务处理不清楚的问题，导致会员有所怨言。¹⁴ 为了解决问题，参与会议者便要求废除这个沿用已久的管理制度，以求革新。

炉主是早期会馆组织的领导人以主祀者身份来作为会馆值年管理者。竞选成为炉主，虽没有限定资格，然而炉主最主要的责任是保管供奉神明的香炉，因此须拥有房屋或者商铺作为存放香炉的地方，也需要在一些庆典上捐款，以立表率。¹⁵ 依照这样的惯例，炉主候选人基本上是从商人阶层中选出来，由此可见这制度下隐藏的弊端。槟城嘉应会馆早期采用的炉主制度即便是经历改革，

¹¹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页 138

¹² 槟城嘉应会馆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页 15.

¹³ 同上

¹⁴ 利亮时，〈锡、矿家与会馆：以雪兰莪嘉应会馆和槟城嘉应会馆为例〉，《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11），页 72.

¹⁵ 颜清煌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 50-51

但炉主一职依然存在，只是炉主不再是会馆组织的领导人物。在新的董事制下，炉主的职能主要只是负责会馆的祭祀活动。会馆定下每年将另举一人为炉主，在阴历正月十三及清明节正日、五月十三日、七月十三日着手办理会馆的祭祀工作。¹⁶ 虽然会馆组织的发展进步是迈向现代化，祭祀事宜并没有因为会馆的制度沿革而削弱其重要性。新增定的章程便有设立一章祭祀以列明炉主的职责和祭祀入牌的简单条规。

此外，槟城嘉应会馆在 1936 年年终的会员大会上选举新一年的年度职员时，值年总理李采成提出一项改革，即把总理与经理的职位名称改换，这是为了符合当时的社会趋势。¹⁷ 因此在该年 12 月 7 日的会议上经过大会讨论，分别将“总理”改称“会长”、“经理”之名义改成“司理”，与此同时加设一名副会长的职位。会议里也同意说选举得票结果最高者举为正会长，票数其次为副会长，司理的职位则是另外选出。

虽然这项变动仅是更换职位名称，会议记录中也没有提及权责部分的变动，司理与副会长两者有何区别。只是在 1937 年的新旧职员交接会议上，连任的会长表示该届虽然将总理制改为会长制，但领导层的职权如故。¹⁸ 按照先前定下的章程内容，司理与副会长两者的工作会是辅助会长，监督会董。然而从 1936 年 12 月 7 日那次会议决定的选票方式，副会长的职位应该是比司理更高，但这观点只是本人浅见，并无史实去深入考察。由 1937 年开始，会馆组织的领导层改

¹⁶ 〈新增定嘉应会馆章程〉，《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2 年

¹⁷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7 年

¹⁸ 同上

成会长制度，至今延续采用此制度结构。即便如此，本文内容对于会馆领导层的称呼依然遵循总理制的职称，以避免出席混淆。

槟城嘉应会馆在二战前的制度改革体现了民主化的趋向，无非是象征着华侨社团的进步。新章程定下后的几年里，会馆的总理或理事们有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对章程内容进行修订，进一步增删一些条规，欲改善会馆制度上的运作。众人经过磋商和审查条规后，才会去通过议决修订章程内容，透过会议记录里可以翻阅当时会馆职员们同心完善会馆章程制度的努力。

第三章 会馆的运作概况

从 20 年代槟城嘉应会馆经历改革后，内部的理事为了会馆的发展，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并实施一些计划以便造福会员与侨胞。本文将那会馆的会议记录所翻阅的事迹整理出来，对会馆在当时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进行论述。这一章节将概括会馆的重要计划，并且由此去探讨会馆的实际财政情况。

第一节、阅报所与夜校计划

1923 年 2 月 28 日的大众会议里，值年会董李采成提议会馆应该要设置一处阅报所，除了鼓励会员在闲暇时光来会所阅读报纸，也可借此联络同乡的感情。¹⁹ 这项计划带到 3 月 2 日的会议里继续讨论，并确定了阅报所设置于会馆公所里。槟城嘉应会馆会史记载道：一九二四年议决停办原有的疗养所，因为不合卫生规格标准且办理诸多困难，而政府医院设备完善、医药照顾佳。后把地点改作会馆阅报所。²⁰

透过槟城嘉应会馆的阅报所的成立，我们可以探讨 20 年代至 40 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发展时期。回顾历史，五四运动在 1919 年展开后，影响这个时期

¹⁹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3.

²⁰ 槟城嘉应会馆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页 13.

的华文报刊，进而采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个突破鼓励更多马来亚的华侨阅读报刊，获取祖国新闻内容。马来亚获独立前的华文报刊为华侨自己创办，内容对象主要是有关中国的新闻，让身在南洋的华侨同胞心系祖国。尤其檳城有最早出版的华文报章，是华文报刊相当活跃发展的据点。²¹ 檳城嘉应会馆在华文报刊的发展期去设置阅报场所，配合当时的社会现况推广阅读报刊的风气，也是能促进同乡华侨团结。这是因为当时的报刊不仅在资讯传播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更可以支配华侨的思想意识。

除了会馆内设置阅报所，檳城嘉应会馆曾经计划开办夜校。在 1927 年 2 月 27 日的会议里，值年财政杨应崔便提议说会馆的阅报社地址宽敞，可以设置夜学。²² 这夜学班原本旨在提供那些失学少年和白天读英校的学生补习华语。此设置夜学计划获得众人的大力支持，会议当场就有发起筹募“合计捐助有百余元，又议再向各商号捐助……”²³。可惜的是会馆同年也许是奔波于为重建会所筹款经费一事，这个计划就被耽搁着。

直到 1934 年的值年总理熊燮廷及接到一位老师黎耀燊前来商量要在会所楼上开办夜学，熊燮廷因此在 3 月 8 日的会议里提出讨论。议决通过众人赞成让黎教授以嘉应会馆的名义字会所设置夜学，并且规定上课时间由七点至九点，但碍于当时侯政府法律条件，注册事项要由黎先生自行负责。²⁴

²¹ 王慷鼎，〈独立前华文报刊〉，《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 100-107.

²²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7.

²³ 同上

²⁴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4.

第二节、会所的重建计划

檳城嘉應會館館址位於檳城喬治市大伯公街（現今的 Lebu King）22 號門牌。根據會館歷史文獻，自光緒壬辰（1892 年）重修以來，會館建築在幾十年後亦是陳舊破漏。

本人前往檳城嘉應會館進行田野調查時，看見會館里的牆上掛有一個紀念會館重建落成的紀念牌，牌上的文字也有記載關於重修會館的緣由與過程。

一九二七年，值年會長李公采成熱心管務，感館宇破舊傾塌堪虞念先賢大業不容觀毀。即行召開會員大會倡導重行改建工作。議已決立組建館委員會……不料事務正在着着進行之時適值世界不景狂潮沖至而中止，至一九三六年恢復工作。²⁵

依照以上記載參閱會議記錄，在 1927 年 1 月 23 日的會議記錄里，值年總理李采成宣佈修整會館，會議上眾人都是極力贊成。同年的 6 月 6 日會館組織舉行大眾會議選舉出修整會館職員。當時會議的票選結果為：謝仲凱當選為正總理、梁恩權當選為副總理、梁應崔為財政、李采成成為正經理、謝金發為副經理。當場也公舉梁漢生與何建珊為查數員，湯日桓與古堯賓為文牒員，另有 25 人作為協理。²⁶

²⁵ 《檳榔嶼嘉應會館重建落成紀念銅牌》，1955.

²⁶ 《檳城嘉應會館中華民國十年至二十六年會議記錄》，1927.

1929年至1933年间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这一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东南亚华侨的商业与产业造成沉重的打击。²⁷在如此全球经济低靡的因素，会董们原先在会议里兴致满满讨论的这项重修工程也被暂时被搁置，直到1936年才又继续会馆重修募捐计划。该年9月8日的会议记录里，值年总理李采成与众会董商讨募捐员的出业日期，议决订于同年10月1日至14日。同样在12月7日的会议记录里，他们讨论出业募捐的行程，决定先向怡保的嘉应同乡募款，再另外商议前往吉隆坡与新加坡等外埠地区。

从会议记录的时间轴来看，会所的重建计划之所以被耽搁，除了经济大萧条的因素，很大可能是会馆面对祖国战事需要筹款，才为了战事募捐而将会所重建计划的劝捐事宜延后。在1927年7月2日时，当时选出的修整会馆职员第一次聚集开会，磋商捐款的奖励条例，亦举出李采成成为劝捐员主任、谢金发为副主任。²⁸随后在1928年3月17日的会议里，可见计划进展已经来到要准备印刷捐题簿和奖励章程，作出最后讨论与安排。然而在下一个会议里，即5月24日，会馆就召开特别大众会议，主要是为了赈济祖国的山东伤兵难民一事。中国当时接近这个日期发生的战争是济南事件，这部分将在第四章里作探讨。因此，本人姑且推断是因为祖国爆发战事，理事们因为分身于救济祖国筹款工作，让这个会所重建计划不得暂时中止。当然，此计划暂时告一段落后，就因为经济危机的冲击，导致计划迟迟被延展到1936年才恢复为筹款会馆重修的讨论事项。

²⁷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页658-660.

²⁸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7.

檳城嘉應會館的重建工作是在 1938 年 8 月 11 日開始動工，一直到 1941 年 7 月間竣工，並於同年 7 月 20 日舉行會所開幕典禮。²⁹ 這項工程除了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同鄉華僑對於華社的修建募款表現踴躍，慷慨解囊，會館的領導層也不辭勞苦為了籌獲足夠資金帶領理事們在馬來亞四處奔波。會館里的重建落成紀念牌里也特別表彰幕後功臣之一李采成的功勞，“李采成不辭勞苦，親自領導出發英暹各屬分向各同鄉力陳重建館宇之重要，積極勸募不遺余力，深得各埠同鄉踴躍慷慨解囊募集，成績于馬到理想。”³⁰ 一方面，從會議記錄里所記載的會所重修進展也可以觀察檳城嘉應會館本身在當時的財務狀況，在下一個篇章探討之。

²⁹ 《檳榔嶼嘉應會館重建落成紀念銅牌》，1955.

³⁰ 《檳榔嶼嘉應會館重建落成紀念銅牌》，1955.

第三节、会馆财务状况

在二战以前，槟城嘉应会馆主要收入来自于店租、会员入会基金、以及入牌位的纳银。在那时若要入会，只需缴两元即可。至于入牌费用，为“特牌一面须纳银三十元，侍牌一位须纳银十元。”³¹ 各个款项是由书记收取后交给值年财政保管。据会馆章程，可知道会馆的基本支出款项。虽然会馆各理事是义务任职而没有薪酬，但书记有每月津贴三元。会馆也有以下开销“每年津贴值年炉主二十元，每月支看馆役夫工君十元，又支馆中油灯什费六元。”³² 了解会馆的收入与开支后，便可以探讨会馆内部的经济情况。

本文所研究的会议记录年份范围里，会议上十分常见的议案便是关于会馆财务以及筹款事项。透过当时领导层与会董的商讨，可以去探究会馆在那个年代的财务能力。以下将按年份顺序列出会议记录里关于槟城嘉应会馆财务状况的内容作出分析。

首先，会馆里头的设备在那时候可能还算不上齐全，会馆的管理层曾经为了给会所设置电灯一事就与众会董们开会商讨几次。1923年2月28日会议记录中，有议题是关于会馆想要签题款项安置电灯事，议决为举出几位职员为“设置电灯劝捐员”去寻找赞助来募捐足够的资金为会馆安装电灯。

接着从1927年的会议记录来看，当时总理宣布要重修会馆的决定是会董理事人员都一致赞成的。然而槟城嘉应会馆本身经济能力不足以负担昂贵的整

³¹ 〈新增定嘉应会馆章程〉，《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2.

³² 同上。

修费用，因此议决“经费由各资本家、各商号、各埠同乡捐助”³³。会馆的董事们为了筹募奔走本地各区的嘉应会馆劝捐，可见当时会馆的经济实力的弱势。而在1928年12月30日的大众会议上，杨应崔曾提议修整会馆的店铺，因为已破陋不堪，议决最后是“若小整经费尽凭财政与总理主意，若是大修整百元以上，须要另开会论之。”³⁴而之后的会议记录没有参阅这件事的后续进展。

先前提到1929年出现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无疑是深深地影响了会馆的内部运作。本人在整理会议记录发现槟城嘉应会馆在1930年代后面临更多的财务困境，也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为了确保会馆能度过经济难题，领导层和会董们在开会上不乏讨论要开源节流，在钱财支出方面持有谨慎的态度。例如在1931年2月7日的会议记录里便讨论关于举办农历正月十三祭祀关帝的法事，需要改良办法。值年总理李采成指出旧时会馆每次遇上大日子要摆酒席，会预先向各店铺捐认捐。虽然设宴当日出席者占多数，但是缺席者也是很多人。每次如此便会导致浪费的情况。“致使办事人虚糜酒席，有损经济。此需要改良办法。”³⁵杨应崔认为作为会馆的职员都一律需要出席。梁汉生则建议在沿门劝捐时候若认定能登席者，就给予登席徽并当场收下捐额。这样一来即便认捐后缺席，也对公家无损，杜绝浪费。

在经济大萧条的时期，槟城嘉应会馆的阅报所一度受到波及，影响其运作情况。在1932年12月11日的大众会议上，值年总理李采成因为“自从店税减

³³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7.

³⁴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³⁵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1

少，对会馆用费出入抵对，所存无几”的缘故，提议把附设在会馆的阅报所暂停。此议题并未在那次会议解决，延展至 1933 年 7 月 22 日的职员会议上才有议决。当时的查数梁继琼在那场会议里报告店租事项的同时，更是禀报会馆当时的财务状况是“支出收入不平衡，无法开源只能节流”³⁶。值年总理李采成恳请众董事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会馆的阅报所只限日间开放。这是为了要节省会所的电费开销，因为天黑后需要使用电灯照明。

除此之外，槟城嘉应会馆在 1936 年期间收到一本捐簿，是槟榔屿的华人社团筹备资金购买战机送给中国当时的领导人蒋介石作为寿礼。该年的 9 月 8 日会议记录里便讨论这个课题，可知晓会馆当时面对的经济问题。“主席宣布本会馆款项支绌，应否酌量捐……本会馆已係无力多捐，寡助又属于不雅，总以免捐为是……”³⁷ 出席会议者梁汉声便指出出钱买贺寿礼物本是自愿性的举措，况且所发来的捐簿没只指明要以会馆名义认捐。所以那时讨论出的解决之策为拿这捐簿向五属同乡劝捐，凭着认捐款额缴交，是比较两全的做法。由此可见会馆内部的经费有所不足，在应对这样的劝捐事务是陷入窘境，只能另外寻思办法来解决。

通过以上梳理会议记录有关会馆财务的记载，可见槟城嘉应会馆在当时的经费不充裕，财力有限。尤其是逢上 1929 年至 1933 年的全球世界经济危机，会馆的运作情况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先是在筹募重修会所的活动因资金短缺被迫中止，经济不景也造成会馆的收入来源有损，只能限制阅报所活动时间。面对这场经济危机，会馆领导层和会董们对于欠款者的态度相对通融。

³⁶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3

³⁷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6

1932年6月6日的职员会议的议案里就有讨论到一位华侨温慎姑曾向会馆借款应付店税，如今已还清债务后要求减低利息。同时，值年总理也提及说接到住客来信要求减店租。针对这两件事，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迁就。对温慎姑求减利息一事选择酌减利息，对住客的减店租要求会董们议决让主席自行斟酌稍微对租金减扣。1933年7月22日的会议记录便提及“如不将店租降落，恐住户搬走后一时无入承租，致妨碍会馆收入，实属不得已方法。”³⁸ 据记载，虽然该住户十分顽固，但会董也认为经济不景要收租十分困难，只好通融。

利亮时对槟城和雪兰莪嘉应会馆的研究里，将两个会馆作出比较，发现槟城嘉应会馆财力远远不如雪隆嘉应会馆。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槟城没有发现庞大的锡矿量，客家嘉应人口在槟城占少数，以及客家人在槟城营商利益基础不如吉隆坡。³⁹ 槟城嘉应会馆论会员人数和会馆资源与业务会比较少，所以组织的财力相对比较弱，也面对许多的资金上的问题。会馆在需要经费进行重大工程时候都需要向新马的同乡社团筹款，但所幸在各界人士与华侨社团的热心捐助下，会馆依然能够度过难关。其中1936年的重修会所一事，捐款芳名录里便有列出当时捐助的社团，如：本屿五属同乡会700元、怡保嘉应会馆500元、星洲嘉应会馆500元、吉隆坡嘉应会馆100元。⁴⁰

³⁸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3

³⁹ 利亮时，〈锡、矿家与会馆：以雪兰莪嘉应会馆和槟城嘉应会馆为例〉，页80.

⁴⁰ 《槟城嘉应会馆重建落成纪念铜牌》，1955.

第四章 会馆与外界的互动与联系

檳城嘉应会馆的开会内容不乏有涉及讨论关于其他社团或组织的事项。本文将探讨会馆本身在那个时代与各界的互动与关系如何。所研究的外界范围会重点划分成与华人社会的互动以及与英殖民政府的互动，又把华人群体的部分分为祖籍国和本地华侨来讨论。

第一节、与华人社会的互动

（一）对祖籍国的关注与回馈

这部分将会先探讨会馆对梅县事务的关注，再综观会馆对于自己的祖国，中国的关照。

檳城嘉应会馆身为一个地缘性的方言组织，自然是对原乡的事务有所关注。会馆的理事们除了通过书信得知梅县的近况，梅县会特派代表前来南洋造访檳城嘉应会馆。嘉应会馆和梅县的来往亦可见于会议记录中。

会议记录里可发现，会馆有数次接获梅县的同乡前来南洋劝募的消息，派来的劝募代表也曾经来到会馆的开会现场向众侨胞发言。例如有 1926 年 12 月

25日的会议记录里，同乡的梅声报报馆组织派来了郭桂云为代表下南洋来到马来亚向同乡社团招股。当时侯梅声报被时势影响又因印刷工人事因，所以需要梅州的同胞们能够热心捐助。对应此事会董们开会的议决为董事们向檳城的资本家劝捐。

1928年10月24日举行特别大众会议是为了欢迎枚松公路专员郭颖玲。他特来南洋，是为枚松公路交通便利起见，向同乡侨胞劝募。当时郭先生在会议现场给众理事们报告那儿的道路状况以及一路不辞劳苦来到马来亚路途的情形。“该路分为三段建筑，以期早日成功，方便行车，无奈经济关系导致进行延滞故特派兄弟来南劝募。”⁴¹又谈及经过马六甲、芙蓉等地，募捐成绩不理想，直到来到怡保才筹款得两万元左右。

还有1929年5月21日的会议里也记载道：有来自梅县的同乡来南募捐筹办梅县中医院，旨在造就医学人才及为贫民治病。⁴²会馆理事们对于同乡代表前来募捐之举都会选择出力帮忙进行劝募活动，筹办募捐团队。即便是会馆本身经济能力不强，也义不容辞选择出力帮助，为家乡的设施发展作出贡献之举。

其次，1931年6月20日职员会议里，总理谈及家乡梅县的江县长的莅任及对于剿匪工作以及政治成绩表现可观，在今年举办了就职纪念周年联欢会，因此商讨会馆要如何回应。“各团体亲临盛会或具颂词不胜数。今同乡诸君虽远隔海外，理宜本会馆名义敬祝，以表欢忱。”⁴³总理认为与其发电报去祝

⁴¹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⁴²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9.

⁴³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1.

贺，不如以写信的方式比较经济。最后议决为众理事赞成将敬祝词寄往县政府的周刊内业表。

对梅县的事务表达关注与回馈之外，槟城嘉应会馆对于中国的时局有所关注。由于二战以前的会馆领导管理层与会董们都是来南洋谋生的华侨，所以这个年代的会馆组织心态依然是心系祖国。20世纪30年代的这时期是中国面对日本的侵占的时段，这段时期的槟城嘉应会馆的会议记录出现的战争事件里就有历史上的“济南惨案”和“一·二八”事变，会馆的理事们对此表现积极地赈灾筹款。

在1928年5月24日的会议记录，主席便道出开会目的是为了赈济祖国山东军民募捐，召集众人磋商如何募捐。根据会议日期推断当时他们救济的对象是“济南惨案”的军民。“1928年五月3日，日本军实行启衅，射击中国军民，残杀交涉员……是为‘济南事变’”日军出兵阻扰北伐，于五月十日济南失守，中国军民死者约3000人。⁴⁴这个事件激发了海外华侨的爱国情怀，会议上众人在知悉祖国的战况后，对此十分热心的关切。会馆值年经理陈清琴君鼓吹说赈济祖国是国民应尽的责任，总理杨应雇君也提议大家举出劝捐员为先，众人对此表意赞成。⁴⁵这次筹款活动可观察到会馆组织在处理募捐活动时已经开始累计经验，有系统地安排劝捐员的各个职务。会记记录里列出了他们分配人力资源的情况，分出了难行、泥水行、藤椅行、沿门劝捐员等部门。陈清琴也提议将会馆内现款悉数捐助，查现时存款有三百元左右。

⁴⁴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567-568页。

⁴⁵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再者，1932年2月25日的职员会议里讨论到会馆接获槟榔屿华侨各团体赈灾救济难民募捐团来函请求开会认捐。据开会日期查找中国近现代史所发生的大事件，此次的赈灾应该是为了赈济同年早前发生的“一·二八”事变，是中国抗日的战事。

1932年1月28日，日本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起而迎战。国民政府迁往洛阳以示不屈……这是对日本的又一次悲壮抵抗，是为“一二八之役”。⁴⁶

会议里值年总理李采成便说道“救难赈灾本人类之天职亦善者所乐，为况灾区惨，生自国，尤为吾等所关怀。”⁴⁷在场理事们讨论后便推举15人为募捐员去为此事筹款。后续在6月6日的职员会议上，总理也报告说已经把向商号捐款赈济祖国难民的数目通过和丰银行汇回祖国，并在现场展示汇款单子。

中国除了面对日军的侵略战情告急，在30年代里也发生重大天灾，人命伤亡惨重。1931年9月9日的会议记录便记载说此次开大众会议是因为谢湘领事来函告知中国发生水灾，需要华侨社团鼎力相助。“祖国水灾，哀鸿遍野，亟待赈济。请中华总商会、平章会馆择日召集侨众大会，组织筹赈机构，设法进行募捐……”⁴⁸当时开会的理事们认为中国各省灾情重大，应该要以华侨的身份来尽救灾恤患的心意。即便还不晓得中华总商会和平章会馆这两机构要如何协助，当时议决为先推举李采成、古国耀和谢佐文三人为会馆的代表。他们

⁴⁶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页611。

⁴⁷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2。

⁴⁸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1

即可以是会馆指定的募捐员以资赈济，也有备于倘若那两个社团需要会馆派代表便可以加入他们的筹赈机构进行救灾。

针对祖国发生的种种重大事故，槟城嘉应会馆表现积极，主动地帮助赈灾活动之余，对灾民也流露恻隐之心。在会议记录了也可见他们身为海外华侨想要为祖国作出贡献的激昂与热血情绪。当时南洋华侨对这个 1928 年的济南惨案和其他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是献金救济山东受害者。这些筹赈运动反映了各阶层华侨民族主义的表现，已不再局限于关注于家乡局势，而是以民族兴亡的目标为己任。⁴⁹ 在这过程中，热爱祖国的强烈感情深深埋入海外华侨群众的心里。华侨们的心态不只是局限于帮助同乡和祖籍省份或州属，而是扩大到去对不是自己所属的地区或更遥远的地区伸出援手。就如槟城嘉应会馆关照济南这场战事，向山东的战争军民伸援出钱出力。依据庄国土的说法，新马华侨为了声援“济南惨案”而发动的反日运动，是南洋华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界限，能看作是当时南洋华侨从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的标志。⁵⁰

除此之外，槟城嘉应会馆对于中国国内政要的到访，都是表现热烈欢迎，均在会议记录里有讨论。1928 年 8 月 18 日开职员会议是为了欢迎一名国府特派员，朱有光先生。会议里便谈及朱有光是梅县人，情属同乡，是应当热烈欢迎对方。⁵¹ 议决所采取的意见为实行开会欢迎，并设置茶会或酒席欢迎朱先生。在 1933 年 12 月 28 日嘉应会馆召开特别大众会议，记载道总理李采成提早一个小时开会是因为接到刁总领事在当天下午会来到槟榔屿的消息，因此召集

⁴⁹ 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 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页 111.

⁵⁰ 同上

⁵¹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理事们讨论筹备欢迎事宜。“刁总领事为嘉属同乡且系有名之外交家，此次到槟，无论在乡情与谊上均应有所表示。”⁵² 当时议决的招待办法有设宴、准备欢迎汽车以及派遣两位代表参加槟榔屿各团体的欢迎大会。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南洋华侨，基本上多数是第一代来马来亚的华侨，所研究的年份里槟城嘉应会馆的领导层以及理事们也是一样。这类侨民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抱有热忱，而心系祖国。透过会议记录里便记载了当时槟城嘉应会馆对于无论是家乡梅县以及祖籍地中国的关照，提供了史实的写照。除了能够更了解会馆与祖国的联系，也借此去探究当时南洋华侨的民族意识。

⁵²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3.

（二）与本地华侨社团的联系

本文通过会议记录探讨槟城嘉应会馆和本地的华侨社团之间的联系，并考察他们对于会馆外务的参与程度作出论述。

从会议记录来看，槟城嘉应会馆和社区的互动为数不多。这里便简单的整理一些会馆和槟城其他社团在当时的来往事迹。自 1922 年，槟城嘉应会馆有开会来选派代表作为本地大伯公庙职和广东暨汀州信理员。通常都是对方社团写信告知会馆，一般上代表人数大约 5 人或 6 人。据手头上的会议记录，大伯公庙和广东暨汀州会要求选派职员一事并非固定每年都有，这或许是会议记录本身有缺漏的部分。此外，会馆在 1933 年 12 月 16 日的大众会议上讨论关于收到槟城的大埔同乡会举行开幕典礼，以及谢氏宗祀重修落成两个组织所寄来的请柬。会馆为表祝贺，便由值年总理李采成和经理熊变迁作代表去赴约。⁵³

槟城嘉应会馆与其他地区的同乡会馆有书信上的来往，其中会议记录里提及的就有怡保嘉应会馆和吉隆坡嘉应会馆。这两个社团除了为槟城嘉应会馆筹款重修会所捐献资金，也为一些华侨或会馆事务与会馆商讨。

例如会馆就有收到梁燊南的来信邀请，针对梅县区组织华侨社会所出现的争议时段，一起统一态度去谴责此事作为对付之策。此时记载于 1928 年 5 月 24 日的会议记录里“现时梅县提倡组织华侨协会，却苟抽侨民。霹雳方面梁燊南君领函具呈汕省机构，取消该会以息侨怒。”⁵⁴ 梁燊南是霹雳嘉应会馆的

⁵³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3.

⁵⁴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年总理⁵⁵，而对于梅县如此对待华侨同胞，身为同乡华侨的领袖自然是打抱不平，站出来为同乡华侨发言。对于此邀请，檳城嘉应会馆是持有赞成态度，并一并跟随梁总理作出表态。

又一次怡保嘉应会馆在 1930 年又一次来信关于要该会馆要表态反对梅县所要执行的政策。信件内容和梅县报载录了事情内容：

因县治安联席会第十五条，各区乡会所摊派区内侨商之枪支及常费。议决：“侨商殷富，虽不在家尚有代理人料理家产应由代理缴交，若无代理人应责成该姓中父老查明其家产报由该区乡会。请县政府布告变卖抵偿，严厉执行。”⁵⁶

对于如此荒谬办法，会议在座的理事华侨情绪十分激愤，会议记录更是写道现场氛围相当紧张。其中有理事认为故居的治安固然重要，但若依此政策，侨商的家产将深受影响；有者则认为檳城的梅县侨胞应该与怡保的侨胞达成一致举措。最后此事的议决是由主席以檳城嘉应会馆的名义呈请省县二政府把该办法取消，公函措词照着当天会议情形反映，并尽快寄出去以免耽误时日。

再者，会馆曾经需要去帮忙解决吉隆坡嘉应会馆的内部纠纷，记载于 1928 年 7 月 3 日的会议里讨论。当时吉隆坡嘉应会馆来函说明不赞成改建该团的会所，想要请檳城嘉应会馆在这方面站在同一阵线，更是附上一个意见书，求取本会馆的意见和表态。据悉是该会馆在七年前就为修建会所一事分成两派人马，一派是想要把横屋改造出租以便能谋利，另一派的意见则是要想保全会所

⁵⁵ . 霹靂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1974），《霹靂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暨新厦落成开幕特刊》，怡保：霹靂嘉应会馆董事会。

⁵⁶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原本样貌。⁵⁷ 虽然会议里众人是表态不赞成吉隆坡嘉应会馆改建会所，但身在槟城无法真正了解吉隆坡嘉应会馆组织内部的现况。因此决定遵循总理的意见，先致函于该会馆让他们暂时展缓此事，再邀请马六甲、新加坡、芙蓉和怡保的嘉应会馆重要理事去吉隆坡开会才为此事取决。

值得一提的是，槟城嘉应会馆曾经于 1928 年 12 月 30 日的职员会议里有一段记载关于商议发电报挽留新加坡李总领事。“曾经星洲总商会及各团体、吡叻总商会及嘉应会馆，拍电挽留。今本槟城嘉应会馆应否拍电挽留？”⁵⁸ 会议上有人认为李总领事驻叻时候施政有方，令侨民信任，应发电报去挽留以便能够造福侨民。且那时候新加坡和霹靂州的社团致电子槟城嘉应会馆，所以在会议里出席者皆认为会馆应该照着其他社团去发电报挽留该名领事。

令我好奇的是，为何槟城嘉应会馆会跟随其他商会和华人社团去对此事作出回应？毕竟新加坡的领事看似与本会馆没太大关联。我上网查找了新加坡历任中国领事后依据该年份推断这位李总领事是李骏（1892-1948），在 1927 年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又于 1928 年 9 月任驻加拿大总领事，而这位领事的籍贯是广东嘉应。⁵⁹ 针对这次槟城嘉应会馆的回应，我解读为他们挽留的心态多半是因为同乡人的关系。身为同个方言群体又是来自梅县的同乡祖籍，会格外多出一份乡情，才会决定随着其他华侨组织去发电报挽留这名李总领事。

⁵⁷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⁵⁸ 同上

⁵⁹ 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页 319.

第二节、与英殖民政府的互动

这一章节也少不了会馆与英殖民政府的官方互动，而这里的政府代表是华民护卫司署。在那个时候这个机构曾几次出现在会议记录里，大部分内容都是会馆理事们开会讨论如何回复他们官方的信函。当时的开会内容不乏提及华侨婚姻事宜、会馆申请准许筹款事宜等等，本文将逐一讨论之。

随着甲必丹制度的逐渐消亡，华民护卫司署从原本是处理华人事务的机构，成为殖民政府对华人事务的顾问。英殖民政府希望能透过华民来监督华人地区，借这个机构成为政府与华侨的中介工具。⁶⁰ 那时候的华侨社团与英国殖民政府的联系是通过华民护卫司署这个机构作为媒介，而会馆这几年的会议记录内容里开会目的也是经常有讨论关于如何回覆华民的信函，可见会馆理事对处理华民信函的慎重态度。在一次的会议记录里，众人通过议决后推举了一个懂英文的董事职员书写英文函答覆华民。“逐公举杨绍成君擅写英文函，以覆华民。”⁶¹ 另有一次会议里，总理便提议说“华民署函件多用英文，李君义文学贯通中西，可否推举为本馆义务英文顾问……”⁶² 由此得知，那时候会馆与华民护卫司的书信来往是用英文交流，可见会馆与英殖民政府的互动是官方且正式的。

⁶⁰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 A history of Malaysia》，（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页 210-211；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页 104.

⁶¹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1.

⁶²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4.

会馆曾被要求捐献钱财给予华民护卫司。据记载，檳城嘉应会馆当时每年给予的年捐有 25 元，会议记录便有写出华民几次写信要求会馆加捐的事迹。例如在 1923 年 12 月 8 日的会议，值年总理古秀階宣读当年 11 月 22 日收到来自华民护卫司的信函要求檳城嘉应会馆增加年捐，即保良局年捐。当时开会的理事们认为既然是当地政府致信来劝说会馆增加年捐，这又属于慈善事业，会馆理应答应。“是宜加捐，但本会馆现时出息微薄……只能酌量加捐五元。”⁶³ 同样的在 1928 年 3 月 27 日的开会中记载道：“保良局华民来函，该局经费不敷，欲赖本会馆加捐，助以资充足。”⁶⁴ 当时开会的理事职员也与上述有同样的表示，亦是说要酌量增加捐献款额，最后也议决加捐五元。“旧时捐助二十五元，今加捐五元，共三十元。”⁶⁵

巴素英总督会在 1926 年委任了一个华人婚姻委员会，报告关于海峡华侨殖民地华侨履行婚姻的习俗、仪式与礼节。⁶⁶ 这个委员会便有建议新旧式的婚礼应需要实行注册的政策。而早前会馆的值年总理何建山便于 1925 年 9 月 30 日召开特别大众会议去讨论华民在 23 日来信询问有关华人婚姻注册与离婚问题的事宜。其中一名理事梁汉生提议道：“婚姻注册及离婚事关系极重势，必慎审周详，看各社团之主张如何再由总理答覆，并举本会馆五属绅士有学识者数人，由总理写函询问……”⁶⁷ 议决也赞成通过其提议。英殖民政府想借此理解华人的文化以及婚姻观，进而在能够订立一些法律界定有效的婚礼等条规。

⁶³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3.

⁶⁴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8.

⁶⁵ 同上

⁶⁶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 102.

⁶⁷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5.

1931年9月9日的大众会议里，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华民护卫司来函允准华人公众假期删除一日补作双十节为公假。信函的内容为“吾华人欲双十节作为公众假期，政府业经允许，但吾华人假期中抽出一日填补双十节为公众假期，尤更妥善。”⁶⁸ 那时候的华侨社团应该是曾经向英殖民政府申请要把祖国的国庆日十月十日作为公假。总理李采成认为华人农历的正月初一和初二两日一向来是公假，最后理事们议决取消正月初二的假日，来填上双十节假日，并将决定覆函于华民司署。从这一事也可见当时华侨对祖国的依恋，宁可牺牲华人的农历新年假期以争取中国国庆日的假期，虽然他们身在海外但心态上依然选择效忠于祖国。

另外，1934年2月20日职员会议里讨论关于筹款事宜，值年总理熊燮廷便指出华民政务司（于1934年从华民护卫司改名为华民政务司⁶⁹）在1927年已经准许会馆进行会馆重修的募捐活动，但可惜因为遇上经济不景气才不得中止。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管制下，那个时代的华侨社团的活动需要去申请获得批准才能进行。

从这些开会内容里可以看见当时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华侨的管束。负责管控华侨的便是华民护卫司署，这机构掌握一定的权责，有能力去替华侨向政府发言，亦可替政府督查华侨社团的概况，让英殖民政府能更好的去掌控海峡殖民地的侨民。

⁶⁸ 《檳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31.

⁶⁹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页104.

第五章 结语

自二战结束后，约 1946 年起槟城嘉应会馆的理事选举从一年一次，变成两年一届的选举方式。而本届（2020/2021）会馆理事选举落于 2020 年 3 月 8 日开会选举。槟城嘉应会馆一路走来肩负推广客家方言与文化的任务，近年来积极发展组织活动，同时会馆也会相应和支持嘉联会所举办的活动。会馆曾在 2015 年随同嘉联会组织的“梅州寻根之旅”，于 4 月 17 日至 24 日前去探访乡亲。⁷⁰ 又有嘉联会常年承办的嘉联杯全国客家传统山歌及流行歌曲比赛，据悉是在各自会馆内部比赛一轮后，才选派代表前去参加捧场。

目前会所的楼上依然有办公运作，并有几张麻将桌给会员打麻将。底楼的空间则租借出去作为会馆的收入来源，现今是充当土库街周日市集（Occupy Beach Street）的储藏库。会馆总务亦透露说管理层在近期内有打算进行装修工程，而基于会馆属于古迹建筑，所以尚且需要与承包商洽谈。⁷¹

王赓武把 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中期的东南亚的华人划分成三种：第一类华人十分关心中国的事务；第二类华人主要想维持海外华人社会组织的力量；第三类华人则埋头致力于在居住国里争取自己的政治地位。⁷² 而二战以前的马来亚华侨，是属于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华人。从槟城嘉应会馆的战前会议记录，可以在看到那个时代的华侨都有这两类的特点。他们虽为异乡客却心系祖国，

⁷⁰ 拿督斯里李尧庆，〈槟城嘉应会馆近年活动概况〉，采访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和 3 月 7 日。

⁷¹ 陈宽蓉，〈槟城嘉应会馆运作现况〉，采访于 2020 年 3 月 7 日。

⁷² 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 1912-1937》，载于《东南亚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页 200-201.

表现爱国情感之余也愿意为祖国出钱出力。这些华侨对祖国和原乡有密切联系，1928年以后的会议记录便有大量记载了会馆与中国以及梅县之间的来往。

华侨在南洋创办会馆的主要宗旨便是联系、照顾同乡侨胞，故此会馆的领导层和会董们对于组织的贡献也是值得敬佩的。从槟城嘉应会馆增设阅报所与夜学之举，体现了当时华社会团体对教育的关注与支持。华侨对于置办华文教育是充满热心，并肯慷慨解囊资助教育企划。即便会馆本身的财力微薄，也愿意付出去筹办教育事业，如此精神实属可嘉。

槟城嘉应会馆即便在那个时期遇上不少经济困境，理事们依然选择齐心面对，开会讨论解决之策。会馆当时固然财力不强，但他们会为了会馆财务事四处募款。甚至是在会馆经费已抓紧的情况下，会为祖国赈灾、为原乡修建设施筹募等事，帮忙劝捐筹款。其他的华侨与社团也会热心伸援，体现了当时马来西亚华侨的互助精神。尤其是济南事变的战事，崛起了本地华侨的民族和爱国意识，形成了之后华侨社会对于抗日战争的团结趋势发展。

对于探讨二战以前马来西亚华侨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课题，而本论文便重点整理了槟城嘉应会馆1921年至1937年的会议记录内容，来作为华侨研究的切入点。虽然本论文的研究时间范畴不长，也面对史料掌握不完整的情况，在完成这份研究过程中我收集文献史料和分析会议记录内容，并从这方面窥探二战以前的华侨与会馆的处境。即便目前以来鲜少有学者针对槟城嘉应会馆研究会议记录，但这份论文整体而言算不上全面，只是针对几个范围来剖析会馆在那个时代的面貌。故此希望日后自己有机会抑或有其他研究学者着手研究槟城嘉应会馆的相关史料。

引用资料

一、历史文献

1. 《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1921-1937.
2. 《槟榔屿嘉应会馆重建落成纪念铜牌》，公元一九五五年七月廿日。

二、书目

1. 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 A History of Malaysia》，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2. 巴素博士原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史》，槟榔屿：光华日报有限公司，1950.
3. 槟城嘉应会馆一百八十六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会，《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槟城：槟城嘉应会馆，1987.
4. 杜仲全，〈从祭神到俱乐：槟城嘉应会馆立社功能之恒与变〉，《客家文化、认同与信仰：东南亚与台港澳》，页 49-58。台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5。
5.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6. 今崛诚二著、刘果因译，《马来亚华人社会》，槟城：槟城嘉应会馆扩建委员会，1974.
7. 利亮时，〈锡、矿家与会馆：以雪兰莪嘉应会馆和槟城嘉应会馆为例〉，《东南亚客家的变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页 65-82。台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11.
8. 霹雳嘉应会馆特刊编辑委员会，《霹雳嘉应会馆七十周年纪念暨新厦落成开幕特刊》，怡保：霹雳嘉应会馆董事会，1974.
9.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10. 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1. 宋彦鹏，《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12. 王琛发编，《槟城客家两百年：槟榔屿客属公会六十周年纪念文集》，槟城：槟榔屿客属公会，1998.
13. 王赓武，〈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 1912-1937〉，载于《东南亚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
14. 王慷鼎，〈独立前华文报刊〉，《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 87-129。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15. 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16. 颜清湟著，粟明鲜等译，《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17. 颜清湟著、黄昆章译，〈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 1928 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海外华人史研究》，页 123-137。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

三、期刊论文

1. 庄国土，〈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 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页 110-116.

四、访谈

1. 宋燕鹏，〈战前会馆的会议记录〉，采访于 2020 年 2 月 5 日。（采访者：余汶慧）
2. 拿督斯里李尧庆，〈槟城嘉应会馆近年活动概况〉，采访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和 3 月 7 日。（采访者：余汶慧）
3. 陈宽蓉，〈槟城嘉应会馆运作现况〉，采访于 2020 年 3 月 7 日。（采访者：余汶慧）

附录

一、新增定嘉应会馆章程（载于会议记录内）

民国十一年6月17日大众会议通过成立遵守施行。

增定审查章程人：温鹤屏、何建珊、古秀階、李慕参、梁继琼、姚鸿泰。

第一章 会名

- 第一条。本会馆系归嘉应属（即今梅县、兴宁、蕉岭、五华、平远五县）侨胞所组织，故命名为嘉应会馆。

第二章 宗旨

- 第二条。本会馆至设立以联络乡情固传团体实行互助之精神及排解同胞之争执为宗旨。

第三章 馆址

- 第三条。本会馆建筑已久，地址在槟城大伯公街二十二号门牌。

第四章 会友

- 第四条：凡我嘉属同胞如无违背本会章程，经会友一人介绍而纳基金二元之者俱得入会为会友。
- 第五條：凡入会人向总理报告时即行缴付基捨。由總理将其姓名记入会员名籍簿内并发给由总理签押之凭单及其收据以及信据。
- 第六條：虽系同属侨胞，如遇有疾病时疫，纳基金为会员者则每名应缴银四元五角。

第五章 入牌

- 第七条：本会馆上堂设有神龛一座，除旧日所放各禄位牌外，如欲入牌者则特牌一面须纳银三十元，侍牌一位须纳银十元。其排放次第以缴银之先后为准。

第六章 寄宿

- 第八条：本会馆会友遇有偶沾微恙时得暂住馆中请医调治。如其余病已重或患传染病者不得收纳。
- 第九条：凡同属侨胞如系会友遇有老弱残疾者或需可以容身者得在本馆暂住。随由总理于本会馆财政上酌量资助，并向同侨劝捐，如此尚有不肯回家者则不得在本馆长住。
- 第十条：凡嘉属同侨如有由祖国初到或由他埠来槟，尚未有职业者得由会友介绍报知总理着许可后得招待在本馆中暂住，惟不得过一个礼拜以外。
- 第十一条：寄宿人不得在馆中聚赌召妓及做窃窝脏，如查有以上情弊立即驱逐，着系会友即行除名出会并将基金没收。
- 第十二条：寄宿人不得破坏及扰乱馆中公物，并不得污秽会所及不得在馆中滋生事端。

第七章 各职员之组织

- 第十三条：本会馆设总理一人、经理财政各一人、查数一人、会董十六人、书记一人。
- 第十四条：本会馆各职员以选举法选出。选举时期每年一次于十二月初旬以内行之。（至迟不得过十号以外）惟有书记一职则由总理择任之。
- 第十五条：凡属会友均有选举权及被选权。如有对于财政上曾失信用者不得被选为总理及财政。

- 第十六条：选举职员用不记名投票法以票数最多者当选，如总理经理财政查数仅一人任职者用单名票选举；如会董由多数人同任一职者，用联名票选举。开票后衡其票数之最多者连同选任之。如有票数相同者由主席指认或加票表决之。惟一人不得兼任两职。
- 第十七条：各职员任期以一年为限，如有中途缺席时得由各职员开临时会选举补充之其任期以补足前员之期限爲止。若非一心公正办理会务者亦得继任。

第八章 各职员之权责

- 第十八条：总理职任为整顿本馆会务、监理本馆财产以及会议时取决各事项，並指挥各职员办事之进行皆其权责。
- 第十九条：经理有劝住总理、督率会董办理各事之权责。
- 第二十条：财政有管理本馆财产及收支款项之权责。
- 第二十一条：查数有稽核本馆财政出入之权责。
- 第二十二条：会董有参与本馆会务助理、本馆财产、及力任议决各事进行之权责。
- 第二十三条：书记有经理簿书刊物、开传单及收缴店租并关于会务上一切记录之权责。
- 第二十四条：各职员对于同乡侨胞如遇有彼此争执情事投诉时，有集合开会研究调解之责。

第九章 财产之理需

- 第二十五条：本会馆所有现款概亥由财政存放生息。倘若所存数目至一百元时由财政总理用本会馆名义交当地银行存账。凡支取时须经总理财政二人连同签押亦准支取。
- 第二十六条：本会馆地址与会产各铺店等呀攔纸及凡有关于本会馆财政上产业上一切簿书字需与会馆……而每年有旧总理如数兑交新总理接

收保管。如有现款则由旧财政交予新财政存放，其交接期于一月初旬为度（不得迟过十号以外）。

- 第廿七条：本会馆店租及什收（如入会、入牌事项）各款每月由书记收就如数交由财政存放。
- 第廿八条：本会馆各职员皆尽义务不受薪金，惟书记固有往来收数之劳，故每个月酌送三元。
- 第廿九条：本会馆支出常费除书记外，每年津贴值年炉主二十元，每月支看馆役夫工君十元，又支馆中油灯什费六元。
- 第三十条：本会馆款项之支出除额之外，如有特别需用至五十元以上者，须开临时职员会议取决议，方得开支。
- 第三十一条：本会馆财政、查数员得以随时查核。如每年新旧职员代时，财政员须将全年收支数目对众报告。
- 第三十二条：各职员对于财政上如侵吞及浮开情弊，一经调查明确得开大会由公众务议。

第十章 会议

- 第三十三条：本会馆会议计有三种：（一）大众会议、（二）临时会议、（三）特别会议。
- 第三十四条：大众会议每年于选举职员之日召集全体会友，行之规定有二十人以上到会便可开议。
- 第三十五条：临时会议者遇有会务应行兴单及动支款项逾于完额及同胞有投诉什事必须研究解决时，集会全体职员行之。
- 第三十六条：特别会议者遇有关于同侨大体上重大事故发生，必须连同互助时，得集合同侨全体开大会以解决之。
- 第三十七条：每开会议需由总理知会书记先期三日内声明事项，以送传单通告周知。
- 第三十八条：每开会议由总理为临时主席。如总理未到，会由众临时推举之。
- 第三十九条：临时会议以有三分之二的职员出席时即得开会。

- 第四十条：凡会议表决事项以到会之人数赞成为标准。如遇可否参半时，得由会议主席加入表决。
- 第四十一条：倘遇繁冗事项不能一时完全解决及到会者不足规定人数时，得定期继续开会。
- 第四十二条：倘有因前次会议不足规定出席人数至不能开会议者则第二次继续开。虽不足规定之出席人数亦得开议。

第十一章 祭祀

- 第四十三条：本会馆每年另举炉主一人以 X 阴历正月十三及清明节正日、五月十三日、七月十三日 X 办理本馆祭祀之事。即于是日在馆内开设筵宴。凡属同侨于是日曾捐资为办祀之用者，俱得登席至每人至少需要捐资，若干则由炉主因时室体为主。
- 第四十四条：对本会馆入特牌时捐资至二百之以上者，每年于清明节祭祀之日由炉主另具三牲、纸宝、茶酒派人到义山捐资人坟前奉祀。

第十二章 看管人规则

- 第四十五条：看馆人不得借端索取寄宿人及借用公物。
- 第四十六条：看馆人对于馆中公物如非总理许可不得私借与人，既经人借去之物如送回馆时须将各物点数清楚妥为收存，不得漫不经心任意放置。
- 第四十七条：看馆人不得私自招纳侨人住宿。
- 第四十八条：看馆人不得将馆内堂舍私自给人存放。
- 第四十九条：看馆人需将馆内桌椅各物收拾整齐，拂拭清洁，厅堂房舍洒扫洁净，每晚堂内神前点名灯光。
- 第五十条：倘遇寄宿人有不端行为，看馆人应随时报告总理不得有隐匿及通同作弊情事。
- 第五十一条：看馆人如有违犯以上规则，立即开除。

第十三章 附设报社

- 第五十二条：附设报社意见以本会馆地址宽敞，若整理清洁可以购书报以供同侨闲暇时报阅，可以增智识广见闻，并可以于共同阅书报时联络乡情。
- 第五十三条：书报费可由会馆经费拨用。
- 第五十四条：凡到馆阅书报者务要衣领清洁，言论和平。阅后须整好放存原处。当公物名不得携去及任意糟蹋。
- 第五十五条：凡到馆阅书报者不得裸体……及有不正当之行为。
- 第五十六条：凡阅报人需要互相尊敬以示亲爱之意。
- 第五十七条：馆内书报随时由看管人整理之而看管人不得将书报借给外人。
- 第五十八条：本会馆章程如有未尽善处可有大众会议增改之。

二、1923年-1937年槟城嘉应会馆会馆职员列表

公元一九二三年度职员表			
总理	古秀階	经理	何建山
财政	谢仲凯	查数	谢金发
会董	李慕参、刘安秀、谢琢斋、梁继琼、余玉珊、陈清琴、廖玉兰、俞开仁、廖云凌、梁汉生、刘木秀、熊信康、熊海如、李采成、钟增祥、谢职君		

公元一九二四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何建山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汉生
会董	古秀階、张少琴、古君达、夏柳如、谢金发、王树鹏、冯云凌、钟增祥、李慕参、陈清琴、谢职君、廖玉兰、俞覲斋、熊海如、陈树清、黄世芬		

公元一九二五年度职员表			
总理	何建山	经理	谢金发
财政	夏柳如	查数	梁汉生
会董	李采成、冯云凌、古君达、熊海如、古秀階、梁继琼、陈清琴、杨应崔、陈树清、李慕参、陈绍东、李剑勇、张少琴、王树鹏、古尧宾、姚镇强		

公元一九二六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谢金发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继琼
会董	梁汉生、李菊如、冯玉階、姚鸿泰、何建山、张少琴、冯蓉华、黄育权、夏伟涛、陈清琴、梁共词、姚通顺、李剑勇、钟益山、赖应宜、王树鹏		

公元一九二七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谢金发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夏伟涛、梁汉生
会董	冯玉階、徐隆真、杨满、罗吉筠、钟益三、何建山、姚通顺、王树鹏、张少琴、黄育权、古实階、李树梅、陈清琴、许杏初、赖应宜、曾伟轩		

公元一九二八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陈清琴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古国耀、钟益三
会董	冯焕卿、姚通顺、赖应宜、徐隆真、熊其庆、何建山、熊献章、梁汉生、谢海春、李菊如、姚添祯、曾伟轩、谢金发、王树鹏、张少琴		

公元一九二九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张少琴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继琼
会董	谢佐文、曾伟轩、徐隆祯、王树鹏、丘耀廷、张锺琴、梁义、冯焕卿、姚通顺、古次垣、钟益三、熊海如、冯荣华、杨登达、谢金发、丘禄记		

公元一九三零年度职员表			
总理	梁汉生	经理	张锺琴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继琼
会董	张少琴、谢金发、王树鹏、丘耀廷、李采成、徐隆祯、梁义、冯玉階、谢佐文、丘禄记、姚通顺、赖应宜、谢晋祥、古国耀、熊海如、黎政予		

公元一九三一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谢琢斋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谢佐文
会董	张少琴、王树鹏、徐隆祯、梁义、伍瑞铿、丘泉记、熊燮廷、梁继琼、赖应宜、古国耀、梁汉生、梁晓凡、冯焕卿、古尧宾、曾伟轩、姚淼生		

公元一九三二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伍瑞铿、古国耀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继琼
会董	谢琢斋、古尧宾、冯焕卿、梁汉生、李新伟、熊燮廷、丘泉记、张少琴、古国耀、同昌号、丘和昌、刘云岳、古之石、古次垣、曾伟轩、陈树青		

公元一九三三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熊燮廷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继琼
会董	钟菊秋、谢琢斋、古国耀、江益彬、刘云岳、张少琴、冯焕卿、梁汉生、冯玉階、钟少琴、李新伟、丘泉记、同昌号、古之石、古次垣、陈树青		

公元一九三四年度职员表			
总理	熊燮廷	经理	冯玉階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张少琴
会董	钟菊秋、谢琢斋、古国耀、江益彬、古昌泰、冯焕卿、梁汉生、李采成、钟少琴、李新衡、丘和昌、同昌号、古之石、古次垣、陈树青、熊炳昌		

公元一九三五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冯玉階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汉生
会董	熊燮廷、曾天觉、陈松、谢琢斋、古国耀、梁继琼、古昌泰、温崇华、陈省南、萧木林、梁颀、张少琴、钟少琴、丘泉记、丘和昌、陈树青		

公元一九三六年度职员表			
总理	李采成	经理	古国耀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继琼
会董	熊燮廷、张少琴、梁参元、郑喜焄、王展元、梁继琼、曾天觉、萧木林、陈松、梁颀、谢琢斋、陈树青、熊炳昌、丘和昌、古昌泰、冯玉階		

公元一九三七年度职员表			
会长	李采成	副会长	梁继琼
司理	古国耀		
财政	杨应崔	查数	梁汉生
会董	熊炳昌、熊燮廷、张少琴、梁参元、郑喜焄、王展元、梁继琼、曾天觉、萧木林、陈松、梁颀、谢琢斋、陈树青、丘和昌、古昌泰、冯玉階		

由于会议记录有缺漏，故追溯不到 1921 年与 1922 年选举出的会馆职员。以上列表是对照《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和《槟城嘉应会馆成立一百八十六周年暨主办马来西亚嘉联会第三十六届代表大会纪念特刊》所记载而梳理作列表。

三、照片（资料来源于本人拍摄）



图 1： 檳城嘉應會館外觀



图 2： 會所內觀



图 3：神龕处的香炉，上刻印“光緒廿四年戊戌岁立”及“嘉应馆”



图 4：会馆里的神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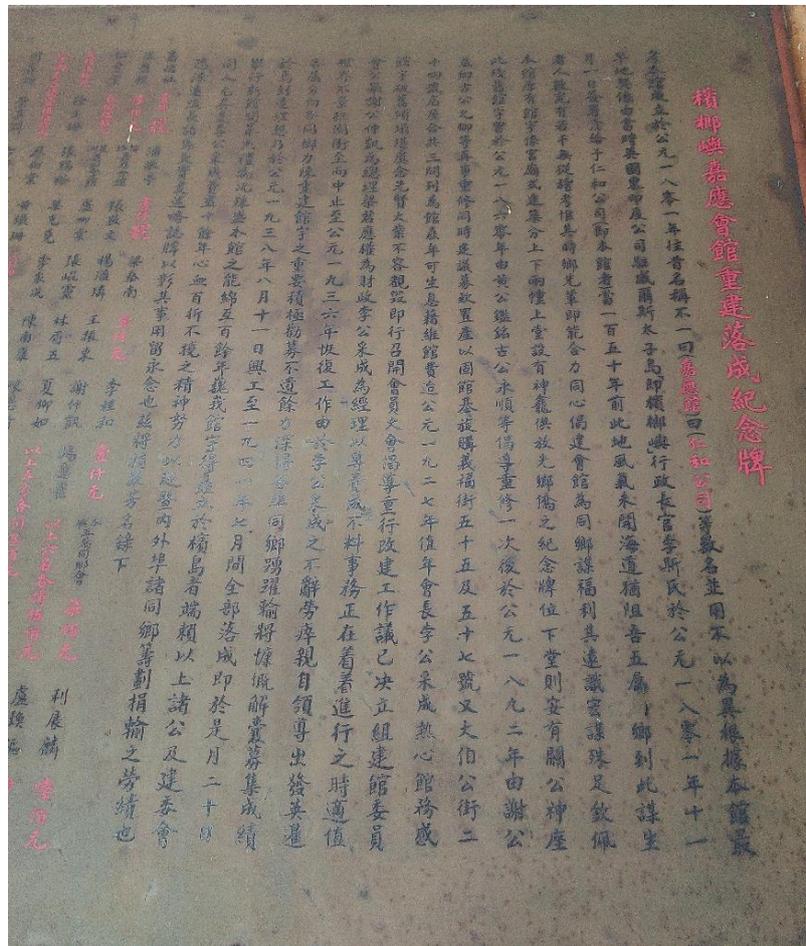


图 5 和图 6:

檳榔嶼嘉應會館重建落成紀念銅牌。于公元一九五五年七月廿日為董事部立。



图 7:李采成先生画像



图 8:杨应崔先生画像



图 9:古国耀先生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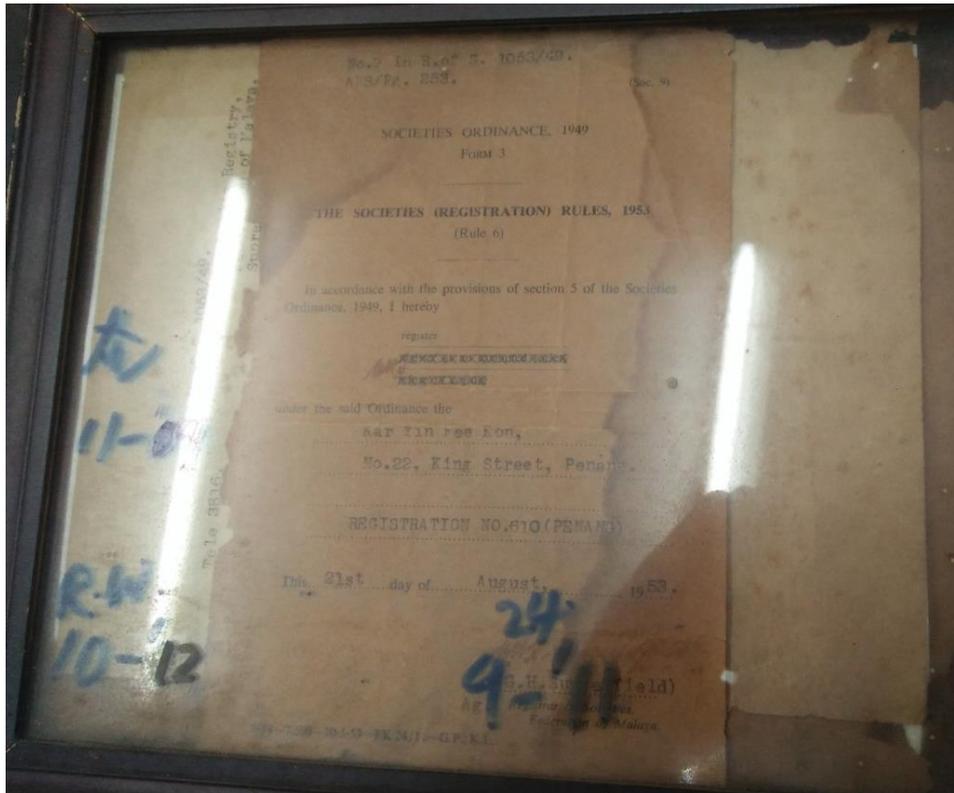


图 10：槟城嘉应会馆的社团注册证书。于 1953 年 8 月 21 日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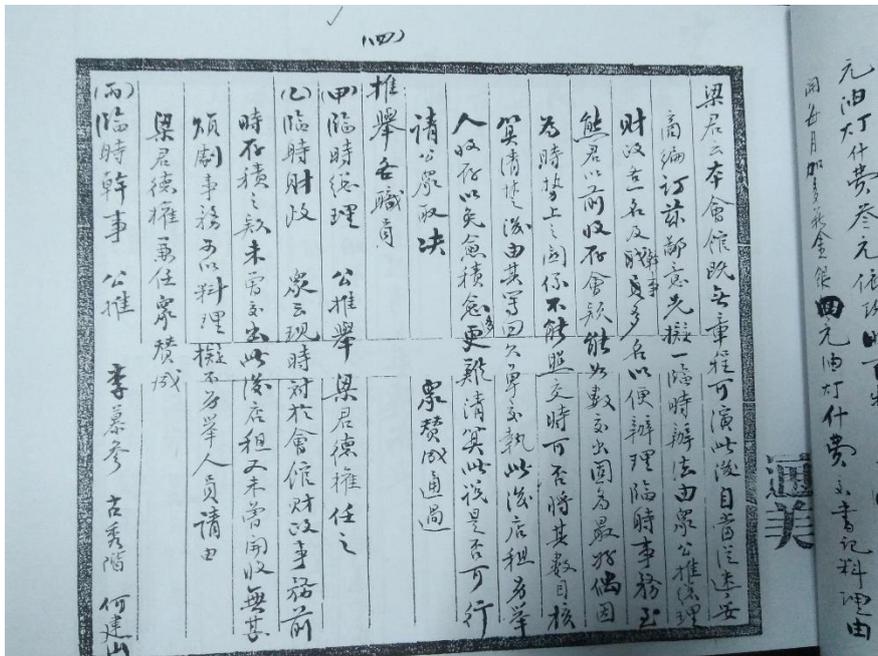


图 11：《槟城嘉应会馆中华民国十年至二十六年会议记录》复印本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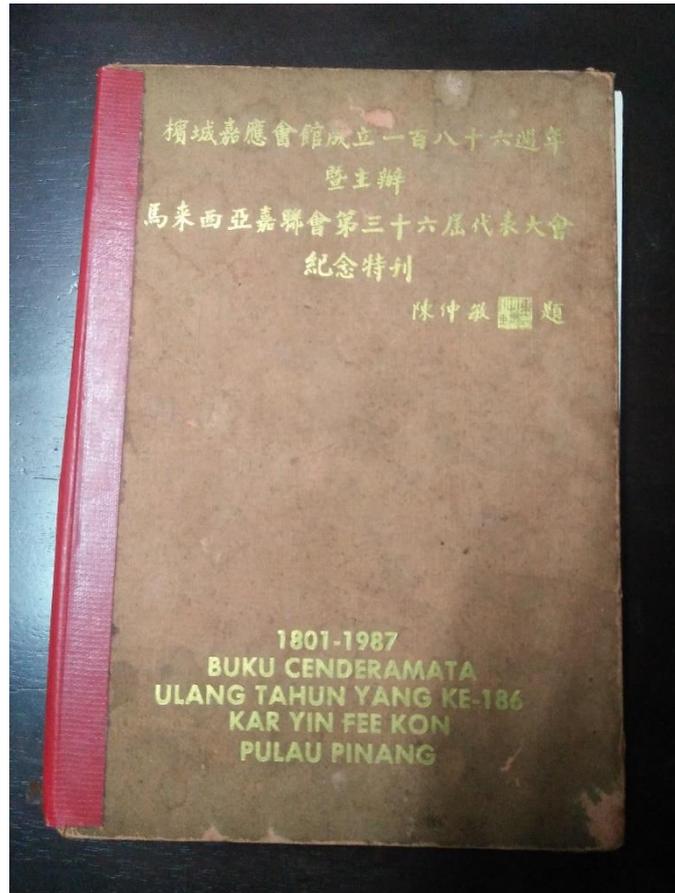


图 12: 《檳城嘉應會館成立一百八十六週年暨主辦馬來西亞嘉聯會第三十六屆代表大會紀念特刊》



图 13: 与受访者拿督斯里李尧庆博士合照